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评介与讨论

赵 芑¹ 田海龙²

(1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34)

(2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天津 300134)

摘要:通过评介批评性语篇分析在 21 世纪遭遇的新批评以及“批评”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含义,讨论学术批评中语言思想的临时性和历史性特征,以及学术批评与批评性语篇分析批评实践的不同。

关键词:批评;语言思想;学术批评;批评性语篇分析

中图分类号: H 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08)08-0143-05

二〇〇八年第八期

南京社会科学

143

一、引言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在本文中指对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 CDA)的批评以及“批评”在 CDA 中的含义。对 CDA 的批评在上世纪 90 年代比较集中,如 Widdowson (1995, 1996)、Toolan (1997)、Schegloff (1997)、Stubbs (1997)和 Hammersley (1997)等人对 CDA 的政治责任(political commitment)、理论基础、文本收集方法及文本分析方法的批评。这些对 CDA 的批评以及 Fairclough (1996)和 Billig (1999)等人的反批评国内已有所介绍(如辛斌 2004,田海龙 2006),本文主要评介 21 世纪初对 CDA 的一些新批评(如 Widdowson 2004, Chilton 2005, Blommaert 2005)。

评介“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旨在讨论学术批评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对 CDA 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批评者学术研究的视角,体现出一定的语言思想;这种视角和语言思想与 CDA 倡导者的观点虽针锋相对,但对更深刻、更全

面认识 CDA 的实质来说双方起到的作用却是相同的。评介与讨论对 CDA 的批评以及“批评”在 CDA 中的含义可以更全面认识 CDA 的本质以及更好地应用 CDA 的原则进行语篇分析会有促进作用。

二、对 CDA 的新批评

对 CDA 的新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老问题的深入讨论。如 Chilton (2005)对 CDA 政治倾向性的效果提出质疑:CDA 试图解决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成为社会公正的工具,这是否具有可信的效果呢?如果 CDA 没有真正的社会效果,那么它在理论上对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值得感兴趣的贡献,对语言学则更是贡献甚微。虽然 Chilton 对 CDA 的批评强调了要以语言研究为本,为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政治语篇提供了空间,他对 CDA 政治倾向性的质疑仍然把对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20 世纪 90 年代对批评话语分析政治倾向性的争论焦点在于 CDA 政治倾向性是否有必要,而在 10 年之后 Chilton 的文章里,对 CDA 政治倾

向性的批评已不是它的必要与否,而是它是否有实质性的效果,是否对社会科学和语言学有所贡献。

这些新批评也是在原有批评基础上的发展。例如,Widdowson 这位对 CDA 始终持否定态度的“老资格”对 CDA 的新批评就是一个发展。Widdowson(2004)总结了作者一生对话语分析(包括批评话语分析)的思考,提出了“前文(pretext)”这个概念使其对 CDA 的批评前进一步。所谓“前文”,Widdowson(2004:79)把它定义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动机”,是“做某件事情的一个伪装,目的是为了做另一件事。”Widdowson(2004)进一步解释到,在双向交流中,交流双方对对方交流目的的理解往往取决于调整接受方注意力的语境因素。如果第三方进入交流过程,如一个分析家对交流的信息进行分析,那么对信息发出者目的的认识就不只取决于语境因素,而且取决于“前文”因素。这些“前文”因素调整分析者的注意点,促使分析者分析这个(而不是那个)文本特征以及这个(而不是那个)语境因素。以此为出发点,Widdowson(2004)指出,CDA 的政治倾向性构成了它的社会和政治的“前文”,正是由于这个“前文”的作用 CDA 对文本和语境的分析才变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这里,Widdowson 这位对 CDA 始终持否定态度的“老资格”将其以前批评的 CDA 文本分析的不系统性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是由 CDA 的目的和动机所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他对 CDA 的批评(Tian 2006)。

与 Chilton 和 Widdowson 的“老问题新观点”不同,Blommaert(2005)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 CDA 近 20 年的发展,指出 CDA 存在三个问题。首先,Blommaert(2005:34)认为 CDA 过分强调语言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尤其是 Fairclough 的方法,“特别重视文本的语言分析,具体来讲,就是依赖系统功能语言学”(Blommaert 2005:34)。Blommaert 认为这种对语言分析的强调会带来一种假象,似乎 CDA 所关注的仅是可见的和现存的语篇,而对那些看不见的语篇,如在语言使用者生产这些可见语篇之前社会就作用于他们的那些规约,以及生产这些可见语篇之后这些规约给他们造成的后果,CDA

就漠不关心了。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分析的过分强调和依赖将分析的范围限制在了以文本存在的语篇上面,从而忽略了分析语篇的来龙去脉”(Blommaert 2005:35)。Blommaert 对 CDA 的这一批评并非要否定 CDA 的文本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在其实际语篇研究中对文本分析的重视,是它有别于社会科学中语篇研究(如 Foucault(1972,1980)对话语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和 Laclau & Mouffe(1985)对话语的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是批评话语分析应该坚持的特点。Blommaert 批评 CDA 没有重视分析语篇的来龙去脉,其目的在于指出 CDA 还应注意研究那些潜在的语篇,即研究那些制约语篇的社会语境。Blommaert 认为,语境还没有被充分研究,而“语境研究对于批评话语分析来说尤其紧迫”(Blommaert 2005:51)。

Blommaert(2005)指出 CDA 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局限在特定社会之内。目前,CDA 的领军人物 Fairclough, Wodak, van Dijk, 和 Chilton, 以及社会科学方面对 CDA 有影响的 Foucault, Bourdieu, Giddens, Habermas, Zizek, Baudrillard 等人,主要局限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这表明 CDA 在地域上的局限性。另外,CDA 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主要是第一世界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南北关系”问题,也不是世界体系结构和发展的社会理论。Blommaert(2005:35-36)认为,“没有理由将语篇的批评分析限制在高度集中、后现代、后工业化、高度符号化的第一世界社会。更没有理由认为对这样社会的描述可以当作模式被有效地用于理解当今世界的语篇,因为世界要比欧洲和美国大许多,而且这个世界上社会与社会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Blommaert(2005)认为 CDA 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它时间跨度的局限性。这个问题和前两个问题成因果关系。Blommaert 指出,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语篇研究中很少有历史发展的分析,其原因在于 CDA 对可见语篇的重视,使得批评分析集中在“当前出现”的语篇上。另外,CDA 关注第一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将批评分析集中在“本国热点”问题上

也是一个原因。Blommaert(2005:37)认为,CDA 历史视野的窄小以及重横向轻纵向的研究对批评当今社会整体特征以及在批评中对权力问题的关注极为不利;而且,这种横向的研究即使对社会问题的历史背景及互文性感兴趣也不能替代对权力如何发挥作用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

三、“批评”在 CDA 中的含义

“批评”作为一个术语,在社会科学中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吹毛求疵,在 CDA 中的含义也被很专业的阐述(如 Fairclough 1989, Wodak 1999, 2001, van Dijk 1993, Scollon 2001, Locke 2004),可总结为:(1)批评要揭示语篇与权力的关系,揭示语篇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2)这种揭示是很必要的,因为语篇与权力的关系在语篇中非常隐晦;(3)批评意味着语篇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使其批评实践非常明确的反映自己的立场;(4)批评具有解放的性质,所以批评要注重效果,要导致社会现实的变革。“批评”的这些含义彼此相互联系,例如,“自我反思(self-reflexive)”指批评实践应该反映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利益,是批评话语分析者在批评实践中“对自己的机构位置 and 与其相关的一切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9),这实际上与“社会改革”异曲同工——只有批评反映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利益,批评才有可能变成社会改革的力量,才有可能成为批评者改变现实的社会实践。综合考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批评”的基本含义:

1. 批评是对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探索。语篇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现实制约语篇,另一方面语篇也制约社会变革。就前者而言,在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所谓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新事物不断产生,其生成、传播和应用也使新语篇相应产生。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可以说明社会决定语篇。改革开放 30 年促使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不断涌现,例如在管理方面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社会阶层方面也有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产生的下岗女工等边缘社会群体。这些新事物、新问题和

新现象需要新语篇加以再现、建构并且帮助其传播和应用。即使是以前存在的事物,如农民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需要新的语篇加以再现和再建构。这些随着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新语篇构成语篇为社会制约的一个特定的内容。

就语篇制约社会而言,语篇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引导社会发展变化的实践力量。换言之,语篇对社会现实的再现与建构(反映、折射)也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在这方面,2003 年爆发的“非典”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一种以前未被人类认识的传染病,是一个新病种。基于早期对这个病种的认识,中国科学家在 2003 年 1 月 22 日将其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后来在 2 月底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专家根据掌握的情况将这种病命名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世界卫生组织在同年 3 月 15 日正式用“SARS”取代“非典”(祝敏鸿 2004),但是,“非典”这个名称一直在中国使用。肺炎在中国是一个可以医治的病,没有生命危险;加之人们认为“非典型”就“不典型”,因而“非典型肺炎”在普通人心目中建构的是一种“一般性肺炎”,没有“典型肺炎”严重,是一种不用害怕的“非典型”肺炎。“非典”一词带来的这些联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这种传染病的重视程度不够(柯平 吴志杰,2003)。这个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语篇对社会建构作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语篇对社会的再现和制约作用使得语篇成为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在社会语境的语言交际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往往导致语言资源的分布不均。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一方,掌握着信息资源,控制着信息传播的渠道,具有通常所说的“话语权”。然而,由于他们掌握了再现社会事实的主动权,就有可能使对社会事实的再现反映自己意识形态,使这种再现不是真实的反映,而是有意的折射。所有这一切由于控制语篇的一方处于主导地位而被认为是习以为常,所创造的语篇也往往被理所当然的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对话篇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探索也包括揭示语篇、权力、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2. 批评是导致变革的社会实践。“批评”在 CDA 中是一种社会实践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 CDA 以社会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二是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为研究目的。前者充分体现在 CDA 的研究当中,如对英国福利改革语篇的研究(Fairclough 2001)和对种族歧视语篇的研究(van Dijk 1991, 1993, Reisigl & Wodak 2001),都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为 CDA 的政治使命。CDA 以社会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已反映在其分析框架上面,如 Fairclough(2004)对福利改革语篇的分析第一步是“注意社会问题的符号方面”,第二步是“确定解决社会问题的障碍”,第三步是“考虑现存社会秩序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第四步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一步是“反思这种分析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可见,CDA 的研究始终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

“批评”在 CDA 中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要付诸于社会实践,即 CDA 的研究目的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正像 van Dijk(1993:253)指出的那样,批评话语分析家必须是“社会活动家”。关于这一点,Kress(1996:15)也写到:“语言的批评研究,批评语言学,以及批评话语分析从最初就是一个政治工程,广义来讲,就是改变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商品的不平等分配。其目的是通过分析文本这一强劲的文化产品来揭示不平等的权力运作及其效果,进而将过剩的权力不均置于危机之中,并由此帮助实现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秩序。”

CDA 进行批评的目的是导致社会变革,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这是其对自己研究工作反思的结果。所谓“自我反思”就是认清自身的利益和立场,使自己进行的语篇研究反映这些利益和立场。具有批评意识的科学思想必须具有自我反思的意识,即要使自身的研究反映科学思想的利益和立场。正像 Rajagopalan(2004)指出的那样,“是批评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思考科学本身到底是要干什么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反思”是语篇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对 CDA 而言,他们通过对社会实践者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创造出自己的语篇,这些语篇作为“对社会事实某方面社会构建

所形成的知识”(van Leeuwen 2005:94),又成为 CDA 参与社会实践的语篇。Wodak(2001:9)号召“将研究结果应用到实践中去”;Fairclough(2001:264-265)甚至号召 CDA 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一起设计和进行研究,并在诸如残疾人的社会福利改革中进行实验,要把研究成果发表在小册子、报纸、杂志或者互联网上,把研究结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来以拥有更多的读者。

四、语言思想与学术批评

简述了对 CDA 的新批评和“批评”在 CDA 中的含义之后,有必要讨论语言研究中的语言思想与学术批评的内在联系。作为一种学术争论的思辨方法,对以往研究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提出新的学术观点铺路。例如,Chilton 批评 CDA 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其目的在于强调 CDA 应该注重语言学分析,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更多的集中在发展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这为他提出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政治话语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也使得他对 CDA 的批评成为“建设性的批评”(Wodak 2006:606)。然而,并非所有为提出新的学术观点而进行的批评都可以被认为是建设性的。Blommaert 从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指出 CDA 的不足,对权力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研究,其学术观点和研究视角不可谓不新,而且在这些批评的基础上他提出“世界体系的格局影响交际”这个一直被忽略的命题,实属新论(Wodak 2006:606);但是,他对 CDA 的批评与没有提出任何有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方法的 Widdowson 一样(Wodak, 2006),被认为是采取某种手段“将自己的研究与其它研究区别开来”,如采取批评性的评论,或是指出某些未解决的问题,或是综合一些方面而详述其它方面,亦或是贬低(歪曲)相关方面或不提及重要的研究(Wodak 2006:603)。

这里,不可避免的遇到语言研究中有关语言思想的问题。“语言思想(language ideology)”的概念表明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对语言与事实关系的看法,关于交际如何发生的看法,关于语言理论的正确与否、好与坏、以及表达清楚与否的看法”(Johnstone 2001:55-56)。在这个意义上,参与学

术批评双方的观点只是一种具有解释和描述作用的语言思想,其价值具有临时性、历史性的特点,而不具有规定性的特征。尽管如此,学术批评对学术创新、对更深刻、更全面理解所评论的事物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或许是学术批评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批评不同于CDA的批评实践。实际上,CDA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视角”——“一种带着某种态度进行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van Dijk 2001:96)。从批评视角进行语篇研究所创造的语篇,如对种族歧视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所产生的著作和文章,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这些语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正如Fairclough(2006:6)指出的那样,学术分析也具有实践的意向,学者与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以及媒体一样,“也在某种情况下寻求推动全球化(社会变革)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的策略,而且,他/她们的理论和分析有时也为这些策略目的服务。”

参考文献:

[1]柯平、吴志杰:“‘SARS’与‘非典’——关于术语定名问题的探讨”,《中国语文》2003年第6期,第564-567页。
 [2]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2期,第40-47页。
 [3]辛斌:“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外国语,2004年第5期,第64-69页。
 [4]祝敏鸿:“关于‘非典’的词汇学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72-75页。
 [5]Billig, M. 1999. Whose Term? Whose Ordinarity? Rhetoric and Ideology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10(4):543-558.
 [6]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Chilton, P. 2005. 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 Modules, Blends and the Critical Instinct. In Wodak, R. & Chilton, P. (eds.). *A New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9-51.
 [8]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9]Fairclough, N. 1996. A Reply to Widdowson's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Review."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III): 148-155.
 [10]Fairclough, N. 2001.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Wetherell, M., Taylor, S. and Yates, S. (eds.) 2001. *Discourse as Data*.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p. 229-266
 [11]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2]Hammersley, M. 1997. On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7(3):237-248.
 [13]Johnstone, B. 2001.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14]Kress, G. 1996.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C. R. Caldas - 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1996: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Pp. 15-31.
 [15]Locke, T.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16]Macdonell, D. 1986. *Theories of Discourse: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7]Rajagopalan, K. 2004. On Being Critical.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Vol. 1(2): 261-3.
 [18]Reisigl, M. &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Routledge;
 [19]Schegloff, E. A. 1997. Whose Text? Whose Context?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IV): 1-25.
 [20]Scollon, R. 2001. Action and text: toward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 of text in social (inter) action, 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action. In Wodak & Ma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2001: 139-183.
 [21]Stubbs, M. 1997.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DA.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III): 202-218.

[责任编辑:兆 录]